

18
萃集史话文化中华

古代书院(上)

主编 江伟

蓝天出版社

中华文化史集萃 (18)

古代书院 (上)

邓 科 编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史集萃/江伟主编. —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8. 5

ISBN 7-80081-820-9

I. 中… II. 江…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177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64 $\frac{3}{8}$ 印张 375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定价:286.00 元(全套 60 本)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历代炎黄子孙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先民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继承并发扬优秀的古文化，让它们服务于今天的社会，是当代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华文化史集萃》丛书，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在范围选择上，注意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使之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我们力求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事物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当前状况等，作比较系统的介绍，使之尽可能清晰、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注重实用性和借鉴性。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有效地继承中华文化，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由于水平有限,其中不乏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一	书院与书院制度	1
二	书院的历史	12
三	四大书院的来历	23
四	书院与古代文化	26
五	白鹿洞书院	55
	(一) 白鹿洞书院历史	55
	(二)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90
	(三) 文化的传播	106
	(四) 学术的探讨	113

一 书院与书院制度

“书院”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唐代。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明确地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由此说来，最早所谓的书院是整理与贮存图书的地方，类似于今天的图书馆，与后来所说的书院性质大不相同。

就现有唐代史料来考查，袁枚的说法是正确的。《唐六典》中记载：“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之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报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经则考最于外。”这里说的“集贤殿书院”就是朝廷设立用以征集、整理、刊集、贮存图书的机构，也就是皇家的图书

馆。有了皇家图书馆，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逐渐又出现了民间、私人的书院、书楼、书堂之类。在《全唐诗》标题中所出现的书院即达十余多所之多，如：“第四郎新修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山寺读书院”、“南溪书院”等。可见这类书院在唐代已相当普遍。

那么，最早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究竟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已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有人说始于唐代，有人说始于五代，还有人认为真正是有聚徒性质的书院应始于北宋。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认为书院之名虽始于唐，而真正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则始于宋。

这种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唐末到五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对文人来说，个人的生命安全尚难以保障，更不要说潜心学术，著书立说了。于是，许多饱学之士纷纷避开这残酷纷扰的现实，来到山林偏僻之处，寻找到一个清静优雅的所在，潜心钻研与著述。

与此同时，因为战乱不断，国无宁日，各朝统治者都无心于文教学术的建设，致使官学废弛，众

多年轻向学之士苦于找不到可以专心治学的处所与传业的师长。为了寻求知识与治世之道，这些人也纷纷来到山林之中。这样，在佛家禅林制度的启发与影响之下，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书堂便渐渐演化为私人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的场所，有了“学校”的性质。

书院的产生与书院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时代现实的影响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是书院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书院制度的形成还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

应该说，书院制度就是在佛家禅林制的启发与影响之下形成的。

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明确地说：“盖儒生学者，遭唐末五代百十余年之摧毁，未能痛快以讲学，斯时即有一种向学之要求！而其规制，则不免受当时佛教禅林制度之影响。”由此可知，当时的“儒生学者”们为了满足自己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愿望，借鉴了禅林制度的成功模式，形成了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之久的书院制度。

严耕望先生说得更为详细，他说：“名山古刹既富藏书，又得随僧斋餐，此予贫士读书以极大方便。当时政府不重教育，惟以科举招揽人才，故士

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读山林，蔚为时风。致名山巨刹，隐然为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两宋书院制度，盖亦萌于此欤？”又说：“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况，继续发展，臻于鼎盛，北亦助长读书山林之风尚。……寒士出身既惟有勤习诗赋以取进士科第，而贫无特营山居之资，势必借寓寺院静境以为习业之所。……由此言之，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规其制，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耳。”

总之，书院与禅林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书院多“依山林，即闲旷”建在风景秀丽，人烟稀少的地方，类似佛寺禅舍建于山清水秀，清静优雅之地。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制度与禅林制度有着许多类似之处。

佛教信徒们每依山林名胜之处，规划丛林。每一座丛林，设“长老”或“住持”一人总其成，类似于书院的一院之长，或称山长、洞主、山主、掌教、主讲等。书院的山长往往聘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担任。“长老”或“住持”之下，又分东西两序，东序司总务，西序司教务，下面还有职员赞助。书院之中也设有堂长、斋长、管干、典

谒、经长、引赞等职事，管理风纪、经济、迎宾、祭祀、图书、作息等教务与日常生活中的事务。禅林之中，讲学分为五种，分期举行。一是讲经，多在夏节举行；二是小参与晚参，“小参”即指平时随时开讲，在夜间举行者为“晚参”。“参”就是聚众开示，有益于参禅；三日“普说”，为普通讨论集会；四是“朔望及普茶”，类似茶话会性质；五称作“入室请益”，是学者个人向长老问道。（周子同：《中国学校制度》）书院当中的各种教学与研讨的活动形式与这五种讲学方式也十分相似。

起源于私家藏书，读书的书院与官学和纯粹的私学都不相同，它的地位处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办学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创立了一种成功的教学模式，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院址环境的优美，讲学活动的民主自由，教训之合一，学术上的贡献及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使其不愧有“古代大学”的美称。

综合起来看，中国古代书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学术活动之自由

隋唐之前，中国学者讲学，多在家中设帐，或在侯王府第设帐。宋代以后，讲学则多在书院。书院还既为学者讲学说书，士子求学读书的教育机构，又是学术研究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

书院常常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甚至是某些学派的发源地。古代的许多在文学或哲学方面具有杰出造就的文学家、理学家以及文学流派，如桐城派、阳湖派等就是通过书院来培养自己的继承者，传播思想与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著名书院还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讨论的学术活动思想，容许欢迎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来互相切磋，争鸣与研讨，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竟邀请他的论敌陆九渊升台讲学，并对他的常识极为钦佩，亲自为其在讲义后面书写跋语，后来袁甫与史文卿重建白鹿书院时继承了先辈的传统，聘任朱熹的弟子张洽与遵奉陆学的汤中相继为书院山长。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观点不同的南昌章潢与星子熊滨也同在白鹿洞讲学。清代初

年，任湖西道的施润章在吉安府庐陵县白鹭洲、景贤两书院，请毛奇龄与杨洪才讲论他们各自所持的不同观点。由此看来，自由讲学是我国古代书院之一大特色，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可贵的传统。

（二）优美的教学环境

古代的书院多建在风景胜地。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脚下，白鹿洞书院建在著名的风景胜地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石鼓书院建于湖南衡阳县北二里石鼓山，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下，应天府书院在河南商丘县城西北隅。

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说：“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下如人；陶冶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详查同异，辨明是非，分析研讨是学术研究所侧重的。而在治学的同时，却不能不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的身心的影响，不用说，山林之中清新爽洁的空气，美妙悦人的风景，鸟语花香，青山白云不仅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更有益于心灵性情的陶冶与熏陶。

前面说过，书院的兴起受禅林精舍的影响很大，佛家注重禅室，讲究清净潜修。其用以参禅悟

道的处所也多选择环境优美，人烟稀少的地方，有利于修身养性，书院建置对于院址的选择与此义趣颇为相同。

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中也说：“宋明理学家的讲学，其精舍书院，每择名胜之区，云封深处，结茆构橡，读书环境，清静得很。象明代西樵罗浮等处书院精舍，都是这样的。……清代书院的讲究形势，较明代为重。除府城各大书院限于城里，或建于学宫之旁，或将旧衙署改建之外，在乡邑如新建书院，必选择形胜之地，当时选择形胜，实有两种作用：（1）应取风水，（2）谋合清静。……当时书院很注重环境，求风水是心理上的希冀，而求清静是实际所需要。古人所谓名山事业，就是指后者而言的。”由此更可看出书院建置对于院址环境的注重。

（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书院往往聘请学识渊博，具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来主持院务，称为山长。聘请什么样的人担任山长对于书院声望的高低，生源的多寡，以及教学成败有着很大影响。

书院可以自行选择学生。不同的书院对招收对象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有的书院只招举人，有的招监生，有的收童生，有的则仅要求志趣相投。有的书院以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有的则有地域限制，也有的不管哪一族、哪一姓、哪一地，来者不拒。有的对来学生徒要进行考核，亦有的著录即可。”

在老师选择学生的同时，学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与实际情况选择书院与师长。如某一书院有名师掌教，则四方学子都会闻风而来。甚至有的学者，已成进士，也来此肄业。这些从根本上体现了书院办学精神的自主与灵活。

书院的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以自学为主，就是在师长指导下，学生专心读书，自行理会。除此而外，还有象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等等。

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与书本，还有象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展礼，以及游历自然山水，考察历史名物等活动。这些灵活多样，注重实践的教学形式无疑是特别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四) 传播与发扬学术思想

书院兴起与繁盛是在宋代，这不能不说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书院帮助了理学思想的传播与探讨，而理学的兴趣也促进了书院建设的繁荣。

《宋元学案》中的不少学术派别就是以书院来命名的。如“丽泽诸儒”、“沧洲诸儒”、“岳麓诸儒”、“槐堂诸儒”等等。

宋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大都以书院为阵地来传授讲说自己的思想主张。如朱熹在知南康军时，兴办了白鹿洞书院，并常去那里讲学，“每休沐常一造，与诸生质疑问疑，诲诱不倦，暇则相与优游泉石间，搢幽发粹，竟日及返”，借机传布学说。其它象明代中叶的王阳明、湛若水等都是借书院讲学之便，发表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学文的书院外，尚有学武的书院。明代嘉靖年间，任九江兵备副使的何莱曾创办了肄武书院，招收武弁子弟学习兵法、韬略、武经等。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或

可称作“古代的大学”，在其长达千年之久的存在过程中，以其特有的教育方式与适宜的研究条件为古代的教育事业，思想史的发展，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是中华古代文化园地之中盛开的一朵朵瑰丽的奇葩。